

唐代文學

論叢

總第八輯

陝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學

論 叢

總第八輯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

主辦

西北大學中文系

陝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学论丛
(总第八辑)

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编辑：唐代文学研究编辑部（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

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31号）

印刷：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发行：陕西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字数215,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统一书号：10094·637 定价：2.05 元

《唐代文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编：景生泽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运熙 王启兴 卞孝萱 邓魁英 朱金城
安 旗 郁贤皓 董乃斌 景生泽 阎 琦
傅璇琮

DZ49/34

目 录

天宝诗风的演变·····	傅璇琮 倪其心 (1)
盛唐边塞诗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	葛晓音 (22)
关于马戴及其诗歌创作·····	华 岩 (39)

李白先世之谜

——论李白属西汉李广、李陵、北周李贤杨隋李穆一系

·····	张书城 (55)
许浑行年考·····	谭优学 (78)

《白氏长庆集》校《全唐诗》札记·····	朱金城 (114)
《〈唐语林〉原序目》考辨·····	周勋初 (149)
殷璠《丹阳集》辑考·····	陈尚君 (169)
孟浩然交游中的几个问题·····	陶 敏 (191)

《唐刺史考》序·····	卞孝萱 (198)
--------------	-------------

《李白卒年辨》存疑·····	张昕 陈建平 (208)
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	吴在庆 (225)

争奇斗巧于尺幅之中

——试谈王昌龄七言绝句的艺术特色 ·····

师长泰 (246)

（唐）	“大漠孤烟直”的再探讨……………	姚莫中	（260）
（诗）	杂谈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骆祥发	（263）
（新探）	李太白诗别解……………	徐仁甫	（269）
	李商隐诗诸评之我见……………	[美]刘若愚 肖占鹏（译）	（274）
	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	[美]安东尼·C·于 牟怀川（译）	（282）
（资料）	李白诗在日本……………	王丽娜	（294）
	致读者……………	本刊编辑部	（307）
	补白 “无” “之” 小议（望之）（259）	王绩《咏怀》诗补阙（理洲）（268）	
		《钱中书侍郎来济》非唐太宗诗（穆子）（306）	
		褚亮诗之潘学士（耘艺）（21）	
		沈佺期诗之昌乐郡（穆子）（148）	

“天宝诗风的演变

傅璇琮 倪其心

很久以来，评述盛唐的诗歌，几乎形成一种公认的框架和模式：王、孟山水诗派和高、岑边塞诗派，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概括地代表了整个盛唐诗歌的发展、特点和成就，其他的一些诗人则分别纳入这两大诗派、两大诗人的范围及影响之中。应当说，这一流行的模式是有缺陷的，缺陷的主要点是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现实生活是丰富多采，而又矛盾复杂的，文学现象也同样如此。古代社会生活的节奏没有我们今天的快，古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也没有现当代文学那样的多层次多结构，但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重大的、关键性时刻，社会生活和文学的发展，也会出现惊人的飞跃和似乎令人捉摸不定的流向。天宝时期的诗风，就有这样一种历史倾向。

上面所说的模式，既不适用于天宝，也概括不了开元时期诗歌发展的特点和成就。除了孟浩然确属开元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以外，高、岑、李、杜和王维的主要成就并不在开元时期；而把王昌龄、常建、储光羲、李颀及王之涣、王翰、王湾等著名诗人列入两大诗派，显然存在许多不相适合的问题；同时象萧颖士、李华、贾至、元结等当时有论有诗的作家仅仅视为古文

运动的先驱，摒除在外，甚至列入中唐诗人，也是未为妥当的。倘使横向地看，则似乎除了李、杜交谊的佳话外，盛唐诗人之间似乎甚少联系，很少互相影响。复杂而生动的历史内容被简单化了，丰富可贵的历史经验也只剩下若干抽象的概念。

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有一句名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译版）按照作者的意图，他这个六卷本的巨著，就是想通过对欧洲文学中某些主要作家集团和运动的探讨，“勾画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心理轮廓”。勃兰兑斯注意于社会生活与文学流派的多样化联系，并努力从整体上来把握作家群的时代情绪和心理活动，这种研究方法对我们还是可以借鉴的。

纵观天宝时期的诗坛，使我们感觉到不少诗人似乎从开元盛世的光圈中走了出来，他们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幻想式的雾气，而逐渐学会用一双清醒的眼睛来看现实，我们发现他们饱含诗意的眼神中竟如此的忧郁，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深刻的不安。

是不是可以说，深刻的不安，是那个时期社会上的带有普遍性的情绪，而在文学上，这种诗化了的深刻的不安，则是天宝诗风的基调。

这种深刻的不安，在不同作家群中有不同的反映，下面让我们来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

站在时代前列的诗人感觉是敏锐的，他们的诗歌传达时代

脉搏是灵敏的，反映现实矛盾是迅速的。但是，在古代金字塔结构的封建社会里，处于不同阶层和地位的诗人，生活感受和体验并不等同。又由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社会信息传递滞留，因而他们的创作在反映时代变化的敏捷和步调上并不一致，表现在创作趋势上便显得错综起伏。这种现象，看起来似乎是不同流派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唐玄宗天宝年间的诗风演变，便是这样。

唐玄宗开元年间太平鼎盛，天宝政治黑暗腐败。这一历史现实在诗人创作中普遍得到反映，也是决定诗歌创作趋势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从开元末到天宝年间，至安史之乱爆发之前，诗歌创作有三个趋势是明显的：一是超脱现实，清高隐逸；一是正视现实，抨击黑暗；一是愤世疾俗，崇儒复古。这三个诗歌创作趋势先后起伏，错综发展，而随着政治现实日益腐败黑暗，正视现实的趋势迅速扩大，鲜明突出，成为主导的创作思潮，直接启发和哺育着中唐诗人。

开元二十四年（736），以正直著称的贤相张九龄罢政，口蜜腹剑的权奸李林甫执政。次年，张九龄贬任荆州长史。调动执宰，原是玄宗朝常有的事。但这次变动不同往常，“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资治通鉴》卷214）。张九龄不仅是宰相，而且是开元间继张说而为词宗的大手笔，在文坛甚有声望。因此这一变动在他和接近他的诗人创作中迅速得到反映。他在荆州创作的一组《感遇》诗，以五古的形式，兴寄的手法，朴质的语言，抒写坚守志操、不苟污浊、避祸自全的情怀，便是针对李林甫黑暗专政的。他讽劝朝士不要贪恋高位，要提防暗算：“矫矫珍木巅，得无全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而庆幸于“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他赞

美江南丹橘经冬不凋，“自有岁寒心”，同时感慨“运命唯所遇”，寄托了深沉的不平。这组诗保持着盛世志士风度，同时又有着一种预感到不祥变化的不安情绪，尽管这种情绪还是很朦胧的，但却正是盛唐诗人从理想的追求转变为对现实的不平的表现，既表明诗人清高超脱的政治态度，也体现诗风转变的最初趋势。

大约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张九龄为相之际，襄州刺史韩朝宗偕本州名士兼隐士孟浩然入京，要为孟的入仕延誉。韩的好意虽因孟的狂狷失约而扫兴，但孟浩然却在长安结识了张九龄，成为“忘形之交”（见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两年后，张九龄在荆州召浩然入幕，两人又在一起吟咏了几个月，然后再度分别。可以想见，这几年涉历仕途和结交张九龄，使孟浩然多少了解到朝政的实情，因而使这位以平淡冲和著称的布衣诗人创作中，增添了惋惜和惆怅，而终于潜心归隐，超脱现实。他在《岁暮归南山》中唱道：“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感到矢志蹉跎，为此长夜难眠。而在辞别荆州幕府的那首《望洞庭赠张丞相》中，他激愤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心潮汹涌不平，如浩渺波涛，震撼天地。然而他理解、同情张九龄的处境和心情，想到古谚所云“临渊羡鱼，不如归家织网”，在李林甫专政下，张九龄也是徒有荐贤之心，已无举能之力了。因而也可以理解那首著名五绝《春晓》，诗人从甜睡的觉醒中感到盎然的春意，却更敏锐地觉察到美好的春天在风雨声中渐渐消逝。在这借春的咏歌里，蕴藉着盛世的喟叹和惆怅，表达了一部分士人的情绪。他终于在《夜归鹿门歌》中，听着醒世的“山寺钟鸣”，望着争喧的“鱼梁渡头”，与世人分道扬镳，

独自走向“唯有幽人自来去”的归宿，超脱隐逸。从诗歌的创作趋势看，这正表现一部分诗人从宫阙朝廷渐渐走向江湖山林。

张九龄和孟浩然都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去世。这似乎是文学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而也是一个分界线。在这以后，文学活动就向多样化发展。

把张、孟开端的清高超脱的诗歌趋势进一步推进发展的代表诗人是王维。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擢升王维为右拾遗。王维和孟浩然结识，大约就在孟进京那一年。张九龄贬荆州时，王维为监察御史。当时他虽是三十几岁的成名诗人，却是开元时年辈较小的作家。由于这几年任职御史台，又受张的赏识，他是比较了解朝政内情的。他正直，因而对张九龄说：“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想要归隐。但他软弱，“恐招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郎绿》），怕得罪李林甫，终于没有辞官。于是他选择了一条半官半隐、“无可无不可”的生活道路。他认为“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与魏居士书》），清高超脱，适意自在。晚年更好禅理，虔信佛教。众所周知，在张九龄被贬以前，王维诗的主要倾向是积极开朗的，富有理想和展望，洋溢热忱和激情。此后则先后常住于终南别业和辋川别业。“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优闲优隐，独乐自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辋川集·鹿柴》），醉心空寂，胜似遁世。他不辞官而归隐，改大隐为中隐，从躲避客观污浊变为追求内心清静，悟禅理，得禅悦。他为天宝年间一部分正直而软弱的士大夫开辟了一条容身保位的便道，把清

高超脱的诗歌创作趋势引向更加脱离现实的自我精神满足，使山水田园的自然美也在他的诗歌中变成“色相俱泯”的空寂意境，甚至“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胡应麟《诗薮·内编》）。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个现实，就是王维是怎样在“适时”的外表下掩饰内心的不安。张九龄在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罢相，开元二十五年正月朝廷就设置玄学博士，以《老》、《庄》作为科试的内容，并且任命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兼知史馆事，王维在此后就写有《和尹谏议史馆山池》诗，说“君恩深汉帝，且莫上空虚”，把诗歌作为崇道活动的粉饰。更有甚者，王维在天宝初还直接称颂过李林甫，说“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他又与李林甫的得力文臣苑咸过往很密，苑咸称他为“当代诗匠”，王维奉和苑咸的诗则一并与李林甫也称颂了：“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重酬苑郎中》。又可参见《旧唐书·李林甫传》：“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鬬茸者，代为题尺”）。但是尽管如此，他作为中上层的官员，对于朝政的恶化，终于不能无动于衷，他在诗中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山居即事》）这里面蕴含着诗人多深的意绪，他所钦仰的贤相张九龄和诗友孟浩然去世了，时世是无可挽回地向坏的方向发展，而自己又无能为力，他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寂寞中又透露出一种不安。

从开元末到天宝年间出现的超脱现实、清高隐逸的诗歌创作趋势，首先来自统治阶级上层比较正直的士大夫。他们比较了解朝政形势，一方面敏锐觉察，迅速反映，为之忧愤，而同

时又受上层士大夫固有局限，往往从不苟污浊、洁身自好而清高超脱，反抗软弱。从这一趋势的作品看，大体从关心政治到超脱现实而追求内心满足，从讽刺朝政的兴寄到歌咏隐逸田园的写意，从五古到律绝，而以抒情诗为主。在一个时期内，这一趋势适应中下层士大夫的情绪意愿，反响较广，发展较快。但随着李林甫以及杨国忠专政的罪恶暴露于天下，这类超脱现实的山水田园诗逐渐见弱，而为正视现实及愤世疾俗的创作潮流所取代。

二

事实上，当张九龄罢相、李林甫执政之际，文坛上还有两类诗人活跃着。一类如王昌龄、常建、李颀等久已入仕或刚刚擢第的诗人，他们关心政治，并不超脱现实。另一类如李白、高适、杜甫及岑参等尚未入仕，犹属布衣的诗人，他们还都满怀壮志豪情，展望远大前程。而使天宝年间诗歌波澜起伏、绚烂壮观的，恰是他们的创作，尤其是李白等人。

王昌龄和常建是开元十五年（727）同榜进士擢第的，李颀则在开元二十三年（734）进士及第。王昌龄曾任校书郎，两为丞尉，两度贬谪南荒。常建和李颀则都是一尉之后，久不调迁，弃官归隐。他们的经历归宿并不相同，但都属于下层士大夫，中年擢第，仕途不达，接触社会现实，生活体验和思想倾向有相近之处，诗歌创作上有共同特点和趋势。就主题而言，他们的边塞诗和山水诗比较突出地表现出：热切关心国力的强弱、朝政的得失，对个人出处虽然消极，但并不追求内心满足，而是显示出与世俗的对抗。

王昌龄早年到过边塞，写了许多满怀爱国豪情、歌唱边塞

将士、感慨边愁不解的优秀诗篇，对边塞问题有切实了解和明确见解。到天宝中，他的认识更为清晰。在贬龙标尉时所作的《筌篲引》中，通过叙述一个从西北边塞远流南边的胡族“迁客”的悲愤控诉，揭露唐朝边帅穷兵黩武，邀功求赏，背信弃义，残害世代归唐的胡族部落，破坏边塞民族和睦，挑起战争，制造仇恨；同时明确主张“紫宸诏发远怀柔”，要求“怜爱苍生比蚍蜉”，以期“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侯”。诗人以前主张良将镇边，如今主张怀柔政策，反对开边黩武，同情胡族人民，这个转变显然针对天宝间边政腐败，是切实而进步的。而这诗用乐府旧题叙事，描述典型而如实。比较起来，常建、李颀的边塞诗则具有以古讽今的咏史特点，思想则与王昌龄一致。常建《塞下曲四首》之一，咏叹汉代西域乌孙玉帛朝回的历史，赞美怀柔政策的功泽：“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其三云：“龙斗雌雄势已分，山崩鬼哭恨将军。黄河直此千余里，冤气苍茫成黑云。”则明显抨击边将黩武扩边所造成的祸患。李颀《古从军行》则借汉武帝故事，讽刺唐朝扩边之患，造成汉军士兵牺牲，“胡儿眼泪双双落”，而结果只是“空见蒲桃入汉家”，点缀了汉家官苑。不难看出，这些边塞诗的锋芒已从反对异族侵扰变为反对唐玄宗扩边祸害汉胡各族人民，是天宝间边塞诗的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

在李林甫专政下，正直士大夫仕途不平，容易产生归隐之想。王昌龄曾经隐居，常建、李颀都一尉即隐。他们都有山水诗。开元末，王昌龄因事被谪岭南，路过荆州，有诗赠张九龄说：“邑西有路缘石壁，我欲从之卧穹嵌。鱼有心兮脱网罟，江无人兮鸣枫杉。”明白表示有心摆脱网罗而隐逸，清高自

适，但他更关心国家运遇，感慨地想起《招魂》的名句，体验到屈原流放的心情。他曾从钓鱼体会到仕隐不同境遇，“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知此罹忧患”，理解隐士必须“神超物无违，岂系名与宦”（《独游》），从生活到思想都彻底摆脱名宦束缚，做个真隐士。但他终于没有隐逸，也没有逃脱罗网，而是在“寒雨连江夜入吴”的宦途中，吟赏着“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之二》），磊落正直，坚持志节，不羁不屈，显示出反抗精神。比较起来，常建、李颀的田园山水诗是直截歌咏隐逸情怀的。王昌龄遭贬时，常建有《鄂渚招王昌龄、张僔》，劝他归隐，指出“世上徒纷纷”，认为“翻覆古共然，宦宦安足云；贫士任枯槁，捕鱼清江滨”，表明对时世的深刻失望和对历史的清醒认识。他是要真隐的，做个“别家投钓翁，今世沧浪情”，断绝官宦，存真无名，“碧水月自阔，安流净而平，扁舟与天际，独往谁能名”（《渔浦》）。正是这种情操，使他写出著名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深情赞美这山林禅房环境幽深优美，令人清净自在，“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既有禅悦，更见真隐，寄托清高志趣，与尘世喧杂相对。而善写人物神情的李颀，其山水诗显得清新活跃，但思想实质与常建相近。《渔父歌》写一位“避世长不仕，钓鱼清江滨”的隐者，他“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寓宿湍与濑，行歌秋复春”，竹竿芦薪，水饭荷鳞，自乐全真，“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对奔波仕途的轳轳志士施以同情的微笑，显示出诗人对时世的清醒而失望的认识。在一个秋天早晨，他远望京畿秦川的壮观景象，“远近山河净，逶迤城阙重，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望秦川》），敏感到秋寒严霜笼罩大地，发出岁暮归去的感叹，有

盛世的忧患和失时的慷慨。因而他们歌咏隐逸的山水诗，更接近孟浩然，而与王维不同。他们心里关切现实。

总起来看，王昌龄等代表着一部分下层士大夫的思想情绪和创作趋势。他们关心国家命运，反对腐败政治，认识清醒，态度不苟，逐渐转向正视现实，揭露黑暗，但对底层人民生活 and 情绪则较少了解，也少反映；艺术上仍有盛世气派，多用兴寄的抒情诗和讽今的咏史诗，但已有写实的趋势。如果以张九龄《感遇》作为诗风转变的开端标志，则可以看到以京洛为中心的诗坛出现了两个趋势，一部分比较软弱的诗人日益脱离现实，一部分比较坚强的诗人则逐渐正视现实。后一种趋势显然符合时代进程，因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下层布衣诗人，大步走向诗坛中心，站在时代前列。

三

李林甫专政之初，朝政腐败黑暗尚未充分暴露，大唐帝国表面依然繁荣昌盛。许多尚未入仕的下层布衣之士，远离政治中心，并不了解朝政实情，还没有体验政治黑暗，因而仍自胸怀壮志，充满展望，歌唱理想，情调高扬。开元后期，中年李白在武昌曾结交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赠孟浩然》），热情赞美孟浩然清高隐逸、傲视王侯的品性风度，寄托他自己“不屈己、不干人”的志趣情怀，信心充沛。高适当时正在浪游宋中，穷困而不消沉。他对朋友说：“惆怅春光里，蹉跎柳色前，逢时当自取，有尔欲先鞭。”（《别韦兵曹》）志向依然，待时进取。开元二十六年（738）写出《燕歌行》，在思想上仍属讽谕朝廷任用边帅不当，具有开元边塞诗的特点。青年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应试不第，便“放

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路过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宏愿豪迈，壮心可观。还有那位宰执后世的青年岑参，这几年来往京洛，远游河朔，“酩酊醉时月正午，一曲狂歌垆上眠”（《邯郸客舍歌》）；对贬官江宁的王昌龄诚挚慰勉，“潜虬且深蟠，黄鹤飞来晚”（《送王大昌龄赴江宁》），满腔热情，一片任真。尽管他们年龄大小、出身经历、思想性格并不相同，但朝士“皆客身保位，无复直言”的那种政治气氛，显然还没有传染到他们身上。然而恰是他们的诗歌，在天宝年间发出激发人心的力量。

历史的安排是偶然的，但似乎也有意。开元二十三年，张九龄、孟浩然和王维的相遇结交，成为诗风转变趋势的前奏。十年以后，天宝三载（744），李白、杜甫和高适的梁宋之游，历来传为诗史佳话，在诗歌发展中，其实也具有一个新的创作趋势开端的意义。众所周知，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应诏进京，当了两年御用文人，光宠而不遇，得意而失志，终于在天宝三载辞官离京。他深感朝政黑暗，“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绿水扬洪波”，竟觉得有魏、晋之际那样形势严峻；但他不学伯夷叔齐，而是“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壮志不灭，要待时而起。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遇见杜甫、高适。当时高适长期浪游，深感压抑，牢骚不平。

“燕雀满簷楹，鸿鹄搏扶摇。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渔樵”（《同群公秋登琴台》），似乎甘于浪迹，而其实埋怨得志的朋友不相提携，“京洛多知己，谁能忆左思”（《宋中别周、梁、李三子》），正表明他渴望“铅刀贵一割”（左思《咏史》之一）。杜甫这时三十三岁，比李、高小十岁左右。他与李白在